

告別舊香港敘事 看見香港新價值

觀香港
劉洋

近日，史蒂芬·羅奇以《Yes,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為題再談香港，引起不少討論。平常心而論，他說「舊香港已經結束」，並不算什麼驚人言論。真正值得辨析的，不是這句話本身，而是他由此得出的結論：彷彿「舊香港」不在了，香港也就失去了原有價值，甚至走向終結。

這樣的判斷，抓住了變化，卻誤讀了變化的性質；看到了舊模式的退場，卻沒有看到新角色的形成。

香港價值不由西方定義

必須承認，今天的香港，確實已不是一些西方人士所熟悉、所懷念的那個香港。那個在冷戰後全球化加速擴張時期形成的香港，長期扮演著中西資本與制度之間的緩衝接口，既高度開放，又保持某種相對模糊的身份邊界，在特定歷史階段發揮了獨特作用。隨著國際格局變化、國家發展階段演進，以及香港自身社會政治環境的重塑，這種歷史形態已經成為過去，不會簡單重來。

但問題在於，「舊香港」從來不是香

港唯一的存在方式，更不是衡量香港前途的唯一尺度。把一段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運行模式，當成香港的「本體」，本身就是一種誤判。香港的價值，從來不在於它是否符合某種西方想像中的城市氣質，而在於它能否在現實的國家發展和全球市場之間，持續提供其他城市難以替代的制度功能。

這一點，從跨境交易和商業實踐的角度看尤其明顯。無論是投融资安排、航運貿易、企業境外架構設計，還是解決爭議、資產配置、融資平台和風險隔離機制的搭建，市場之所以長期選擇香港，從不是出於懷舊，更不是出於象徵意義，而是因為香港能夠同時對接國家與國際市場，在法律規則、資本流動、監管預期、交易執行、專業服務和商業溝通等方面，提供高密度、高效率、國際化的制度接口。香港的價值，首先是功能性的，其次才是敘事性的。

因此，判斷香港有沒有前途，不能只看它是否還像上世紀那樣，符合西方資本最熟悉的操作經驗和心理距離。更關鍵的是看，在今天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香港是否仍然具備不可替代的制度優勢。而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羅奇文章的一個核心論點，是香港近

年的金融活躍度越來越依賴內地企業，因此香港正在失去其「獨立國際金融中心」的性質。這樣的觀察和推論能否成立？放眼全球，任何成熟金融中心都不可能脫離其經濟腹地而存在。紐約依託美國整體的經濟、美元體系和美國資本市場；倫敦的長期地位，也從來不是懸浮於其政治經濟基礎之上。香港服務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內地企業融資、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不是國際性的削弱，恰恰是其獨特優勢的現實體現。

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香港是否不再一樣，而是它在改變的同時，能否繼續保持高水平國際化，繼續保有其他內地城市暫時難以完全替代的制度優勢。從現實看，在資本自由進出、貨幣自由兌換、普通法制度、專業服務網絡、解決爭議機制以及國際商業慣例的銜接能力等關鍵領域，香港仍然具備強大競爭力。國際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最終看重的，也從來不是抽象敘事，而是最具體的問題：這裏能否做成交易，能否穩定預期，能否管理風險，能否解決糾紛。只要這些核心能力仍在，香港就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也正因為如此，香港今天面臨的根本不是「是否玩完」的問題，而是「如何重

寫角色」的問題。過去，香港更多被視為「世界進入中國」的前哨；今天，香港越來越承擔起「中國與世界相互連接」的高端平台功能。這不是香港地位的下降，而是香港功能的演進。前一種角色，更依賴歷史形成的中介位置；後一種角色，則更依賴制度專業性、資源配置能力、國際規則銜接能力，以及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不可取代優勢更加彰顯

香港的未來，從來不在於重複過去，而在於開創新的不可替代性。中央堅定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對香港而言，關鍵不是沉溺於「舊香港」的懷舊想像，也不是被外部「唱衰」敘事牽着走，而是要在全球經濟格局重組、產業鏈供應鏈調整、跨境資本與風險管理需求持續上升的新環境下，進一步做強自己的制度優勢和平台功能。

當然，香港並非沒有挑戰。國際觀感、人才競爭、部分行業信心、地緣政治壓力，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問題，也必須認真面對。但有挑戰，不等於沒有前景；舊模式

退場，也不等於城市終結。香港的發展史，本來就是一部不斷調整定位、重組功能、塑造新優勢的歷史。它曾由轉口港走向製造業基地，再發展為國際金融、航運和專業服務中心。今天，在新的世界結構中，香港同樣完全有條件在離岸人民幣業務、跨境資產配置、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供應鏈管理、高端專業服務等領域繼續鞏固和提升自身地位。

說到底，真正結束的不是香港，而是某些人理解香港的舊坐標。今天的香港，當然不再是羅奇心中的「舊香港」；但這絕不意味着香港失去了意義，恰恰說明香港正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一個城市真正的生命力，不在於永遠停留在別人最熟悉的模樣，而在於能否在時代變化中不斷證明自己的價值。

「舊香港」已逝，這是事實；但香港從未結束。只要繼續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不斷提升制度銜接、資源配置和國際服務能力，香港不僅不會失去其地位，反而更可以在新時代打開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開啟屬於自己的新篇章。

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律政司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專家諮詢組委員、香港海運港口發展局成員

36.9℃破紀錄高溫 香港酷熱背後的北極因素

有話要說
余敬中

36.9℃！2026年8月9日下午，香港天文台總部的氣溫讀數定格在這個數字上，一舉刷新了自1884年開展氣象觀測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街頭酷暑難耐，空氣彷彿凝固，熱浪滾滾襲人。

筆者一周前剛從北極考察歸來。在斯瓦爾巴群島，我親眼目睹高緯度冰川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崩塌、退縮，海冰消融碎裂。回到香港，等待我的是這場創紀錄的歷史性酷熱。

這場破紀錄的極端高溫，直接的「罪魁禍首」看似十分明確——強颱風「白海豚」在香港外圍激發了強烈的下沉氣流。下沉空氣像一個巨大的熱風罩，在絕熱增溫效應下將整個城市加熱，再加上晴空無雲下的烈日暴曬，共同締造了這場歷史性的高溫。

然而，我們把視線從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向上拉升，俯瞰整個地球的大氣環流，就會發現一個令人震撼的真相：這場發生在亞熱帶都市的極端高溫，與遠在幾千里之外的北極，有很強的關聯。

看似遙不可及的北極，究竟如何跨越千山萬水，影響到香港的體感溫度？

答案藏在北極劇烈變暖帶來的「連鎖反應」中。氣候學上著名的「北極放大效應」，使得北極地區的升溫速度達到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這種劇烈變化打破了地球原有的熱量平衡，導致赤道與極地之間的溫差逐漸縮小。

溫差是推動全球西風帶和大氣環流高溫運轉的「引擎」。引擎一旦減速，大氣環流便變得遲緩甚至停滯。其結果就是：颱風、副熱帶高壓等極端天氣系統不再像過去那樣快速移動，反而容易在某個區域「卡死」並長期滯留。正是這種氣候系統

的「卡頓」，讓颱風外圍的熱風罩在華南上空停留得更久、烤得更狠。

另一方面，極地海冰的大量融化，像是一塊大自然原有的「冷敷貼」正在加速失效。失去冰雪反射的太陽光被海洋吸收，全球基礎氣溫的「底色」被整體抬升。在30年前，同樣一個颱風的外圍下沉氣流吹襲香港，可能只會帶來34℃或35℃的高溫；但在全球基準溫度被推高的今天，相同的氣象條件，就能輕易突破36.9℃的歷史極限。

極地冰川消融不僅拉高了氣溫，更正以不可逆之勢推高海平面。1954至2023年間，維多利亞港海平面已累計上升約21厘米；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預測，到2100年，香港海平面最高可再升1.07米。海平面的抬升，又不斷拉高極端風暴潮的起跳基座。2018年颱風「山竹」襲港時引發3.88米的水位高峰，造成近46億港元直接經濟損失；而未來在融冰疊加效應下，原本「百年一遇」的巨浪倒灌，恐將演變成「數年一遇」的常態。

大自然從不是孤立的島嶼。香港街頭滾滾的水泥路面，與遠方正在融化的北極冰川，經由大氣環流的無形之手緊密連在一起。

這場歷史高溫與海水倒灌的雙重陰影，不只是一次天氣現象的偶然爆發。10年前，我在執導央視大型紀錄片《北極，北極！》時提出：關注北極，就是關注我們自己的家園。提高公眾的北極意識，踐行低碳生活，促進可持續發展，不應是一句抽象的口號，而是包括香港在內的所有北半球地區人們應有的生活方式，是我們為下一代守住這座東方之珠與全球家園的根本之策。

中國出海企業協作聯盟執行理事長、聯合國未來地球計劃中國委員會委員、極地未來Polar Hub理事

一份屬於每位青年的五年規劃

新聞背後
卓銘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就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舉行第二場地區諮詢會，近距離聆聽各界意見。在兩小時的面對面交流期間，市民對青年發展提出多項問題、建議，而李家超的回應，亦展現出本屆政府關心青年、助力青年、服務青年發展的施政態度。青年工作需要久久為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各界相信，有特區政府的積極作為，以五年規劃為抓手，通過施政報告細化具體政策，定能為包括青年在內的世界市民搭建更大的發展舞台。

這次地區諮詢會雖然歷時不長，但參與的市民問之有物、李家超等官員的回應實事求是，充分展現出政府與社會間高質量的民情交流，亦釋放出多個重要信息：

首先，是香港市民支持、而且踴躍參與首份五年規劃的編制過程。自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先後展開後，政府已舉辦了超過90場諮詢會，收到約13800份五年規劃相關意見，以及約8500份與施政報告相關意見。對比去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期間，政府收到近7000份公眾諮詢意見，五年規劃收到的意見數量接近兩倍，市民所表現出的積極性，明顯不可同日而語。

公眾諮詢意見數字上的倍增，說明香港社會對五年規劃極為重視，深刻意識到這份左右香港長遠未來的重要文件，與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關連，因此必須要以「主人翁」意識積極參與。同時亦間接說明，現在香港社會已對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服務

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發展方向形成高度共識：新階段下香港的發展，必須以國家支持為盾、以自身優勢為劍，方能應對新變化新挑戰。

其次，是社會高度重視青年發展。諮詢會上，多名市民毫不諱言地道出如今香港青年面對的各種問題。例如有市民直言青年置業難，感嘆「買樓先要有富爸爸」，35歲以下青年自置居所跌至不足15%，超過七成人「上車」要靠父母支付首期；更有市民反映部分大學生不敢升職加入工，只為保留公屋輪候資格；此外，長期以來公開試狀元幾乎全選醫科、法律，工程和科學學系乏人問津，也側面反射出香港人才及產業配合的問題。

謀發展拚經濟的大好時機

市民亦在諮詢會上對青年問題提出大量高質量的建議，例如建議利用勞工處作為官方平台，讓有意招聘香港青年的內地企業透過該平台發布職位空缺；提議由民政事務總署牽頭，在18區全面成立「地區青年關愛隊」，吸納中學生、大專生及青年創業者，增加青年的地區歸屬感；以及進一步擴大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的吸納管道，孵化更多青年人才等等。不但展現出市民的热情，也是對特區政府繼續解決老大難問題的鼓勵。

再次，諮詢會亦凸顯出特區政府不畏難的態度。面對市民就青年發展提出的種種問題，李家超沒有選擇迴避，而是秉持着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正面回應，如指出公屋輪候人數已由高峰期的15萬人降至約10萬人，跌幅達三分之一，證明近年大量興建公屋

及居屋帶動單位流轉已見成效。他又強調北部都會區帶來的機遇，不但可改善青年的置業問題，還能進一步關注青年的活動空間、居住面積，全面提高生活質素。李家超亦表示，今年內將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以進一步優化人才政策。說明五年規劃中，青年政策必然是重中之重，也間接鼓勵更多港青投身北都、創科新產業等關鍵發展項目。

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其實自本屆政府上任以來，一直以青年政策為重點着力方向之一。例如2022年底公布的《青年發展藍圖》，全面勾畫政府未來長期青年發展工作的理念和方針，涵蓋青年學業、就業、創業及置業各個層面，緊扣國家五年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等戰略機遇，協助香港青年把握新機遇新優勢。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青年人才培養計劃」，也直接為港青提供了更多參與國際組織實習和國際會議的機會，並推出「傳媒專題內地實習計劃」、深化「青年理財教育計劃」，加強青年對新行業的理解，足見政府對青年的重視和關懷。

李家超已表示，目標於9月內發表五年規劃，並緊隨其後發表施政報告，希望兩者發表時間差距越短越好。首份五年規劃事關香港精準把握形勢和機遇，以更好抓緊國家機遇和應對國際挑戰，如今在特區政府的引領下，社會已高度凝聚共識，也是諸位香港青年謀發展、拚經濟的大好時機。只要港人團結一致、眾志成城，必能開創由治及興新局面。

港高校硬核科技突破 助力國家科技高質量發展

議論風生
宇文

8月4日，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官網發布一項震動全球半導體界的成果。研究團隊成功研製出原子級厚度的「模擬存內搜索」芯片，在處理特定計算任務時速度比標準CPU快約1億倍，相關研究刊發於國際頂級期刊《自然—納米技術》。就在此前一周的7月28日，香港特區政府與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在特區政府總部正式簽署《關於推進部港共建製造業創新中心的合作協議》。

兩則消息揭示了一個清晰的事實，在國家「十五五」規劃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戰略布局中，香港正以硬核科技實力成為打破西方技術壁壘、助力國家科技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

從被「卡脖子」到「換道超車」

港大此次突破的技術意義，遠非「快一億倍」所能概括。傳統電腦的問題在於，處理器與內存之間反覆搬運數據，既拖慢

速度又徒增能耗。港大團隊利用比髮絲還細數萬倍的二維材料二硫化鉬，研發出新型模擬內容尋址存儲器，可直接在數據存儲位置完成複雜搜索。相比傳統靜態隨機存取存儲器需要多達16個晶體管，港大團隊僅用2個晶體管即可構建一個單元。

實測數據顯示，芯片搜索延遲和單次能耗，均比傳統方案大幅降低，這不僅是量的優化，更是架構層面的範式革命。長期以來，西方在先進芯片架構和材料領域構築了層層專利壁壘與技術封鎖。港大團隊從二維材料入手、以極簡架構突圍，用原子級製造開闢了一條繞開傳統技術路線的全新賽道。某種意義上，西方對華「卡脖子」的困境，正被港大「換道超車」的智慧所瓦解。

港大的突破並非孤例。香港在芯片領域的戰略布局，已形成一個從基礎研發到產業落地的完整鏈條。

2024年9月，香港微電子研發院正式

成立，落戶元朗創新微電子中心，專注碳化矽和氮化鎵兩大第三代半導體材料。兩條8英寸第三代半導體中試線預計2026年內投入運作。2026年2月財政預算案宣布預留約2.2億港元，支持在港建設首個落戶香港的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7月28日簽署的合作協議明確，該中心由香港微電子研發院牽頭營運，目標是促進關鍵技術突破、推動成果產業化、匯聚國際人才。

在製造端，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東微電子落戶元朗朗創新園，投資逾8億港元設立全港首個半導體設備生產基地，預計2027年中期正式投產，項目最多可獲得「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約2億港元資助。特區政府推出的100億港元「新型工業加速計劃」，至今已涉及總投資約25億港元，其中超過七成成為私人投資；已支持兩間發展半導體芯片技術及設備的企業，總投資超過15億港元。

從港大實驗室的原子級材料突破，到

微電子研發院的中試線轉化，再到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的全鏈條布局和東微電子的高端製造落地，香港正在從芯片貿易的「中轉站」成長為技術創新的「策源地」和高端製造的「試驗田」。

創科發展的主力軍開拓者

在研發製造之外，香港作為全球半導體貿易樞紐的戰略價值同樣不可替代。據彭博社分析數據，2026年前五個月，中國芯片進口總額達2390億美元，其中經香港轉口至內地的半導體價值達1240億美元，佔比高達52%，創歷史新高。十年前，這一比例僅為約三分之一。

牛津經濟研究院數據顯示，今年前五個月，AI相關電子產品已佔香港出口總額的57%，受對外貿易表現持續強勁和本地需求增強帶動，香港經濟在2026年第一季度按年增長5.9%，創下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單季增長。

香港能成為芯片貿易的關鍵樞紐，在

於其制度優勢，如自由港零關稅、資金自由進出、國際航空樞紐，以及「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單獨關稅區的雙重身份等。芯片廠商可以通過香港保持高頻穩定的發貨節奏，也可靈活儲存貨物以待銷售。這種制度優勢使其在複雜的國際出口管制環境中，成為連接中國與全球科技市場最具合規效率的橋樑。

總之，香港用硬核科技實力證明，在國家科技高質量發展的版圖中，香港並非「旁觀者」和「跟隨者」，而是「主力軍」和「開拓者」。當外部對華技術封鎖步步收緊之際，香港以其頂尖的基礎研究、完善的產業布局、獨特的制度優勢和不可替代的貿易樞紐功能，正成為中國打破西方科技圍堵、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變量。

香港地位不可或缺，這不僅是國家戰略的清晰定位，更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進程中的歷史必然與現實選擇。

經濟學者